

被毛泽东赞誉为『飞将军』的黄公略

□ 郭婷婷 马晓敏

毛泽东复电“这个问题由公略同志自己处理”。黄公略得悉后，他不顾母亲和妻子尚在敌人手中，当即给毛泽东回复，旗帜鲜明地表态：与黄梅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梅庄处以死刑，将他的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并回电彭德怀：“大义灭亲，就地正法！”黄公略的大公无私令毛泽东不禁感慨：“我们的事业有这样的同志为之奋斗，还能不成功吗？”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黄公略自幼聪慧，酷爱读书，善于学习，文化素养较高。他不仅懂得抓边区根据地建设，还善于抓军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缔造者与组织者之一，为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及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贡献。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领主力部队上了井冈山，黄公略则率领少量部队留在平江、浏阳一带独立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下，黄公略主动向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学习，总结出许多灵活机动的战术，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游击战术》，这是红军第一本探索游击战术的论述，为红军游击战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0年初，红六军正式组建，黄公略任军长。红六军组建之初，由于成分复杂，游击习气浓、地方观念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黄公略组织召开红六军干部会议，成立军委，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使红六军从分散的游击武装转变为集团的正规红军。吉安破头“二七”会议之后，根据前委“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的决定，黄公略率领红六军分散在赣水两岸广大地区，一面同敌人作战，一面宣传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使赣西南苏维埃区域得到很大发展，不仅横断江西半壁山河，还与湖北的通城通山、广东的东江潮梅、福建的永定龙岩取得联络，把湘鄂赣闽粤连成一片红色的世界。看到形势大好的赣西南苏区，毛泽东诗兴大发，在马上吟出豪迈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的“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正是对黄公略的赞美和肯定。

“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1930年7月红六军改称红三军，黄公略任军长。在他的带领与指挥下，红三军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主力部队。奔袭文家市、抢占醴陵、攻打吉安，红三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红三军更是屡建奇功。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红三军，在黄公略的指挥下，以“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首战于龙冈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9000余人，生俘师长张辉瓒。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三军担任中路阻击任务，为夺取战机，黄公略与毛泽东一起在向导的帮助下，找到一条从东固到小洞的山间小路，并下令红三军沿小路快速隐蔽前进，提前设伏。待包围敌军后，黄公略率领隐蔽在中洞南侧山林中的红三军，居高临下，从山上用战斗队形横压而下侧面突袭，敌军毫无招架之力，很快就放弃抵抗、缴械投降。当时在白云山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大为振奋，挥笔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赞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从此，黄公略“飞将军”的美名传遍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率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于莲塘、次战于良村、再战于黄陂，三战三捷，歼灭敌军三个师一万余人。在老营盘战斗中，黄公略指挥红三军三个师及独立五师歼灭国民党军蒋鼎文第九师独立旅，打了一个没有命令的大胜仗。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兴国方石岭追击战，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等部。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黄公略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在黄公略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并撰写挽联，对黄公略的光辉业绩和卓著功勋作了高度概括：“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二十三年斗争

□ 余群勇

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18军为主力的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这对有效减轻其他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

1936年6月以后，挺进师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恢复浙西南的工作，在浙东、闽浙边、遂（昌）宣（平）汤（溪）边区等地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粉碎国民党军约10万兵力的第二次大规模“清剿”计划，在彼时全国革命低潮时掀起革命的局部高潮，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

全面抗战期间，浙西南成了战时浙江的省会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中心，浙江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后方，浙江抗战的大本营。正如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指出，浙西南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要战略支点”。

抗战胜利后，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做好和平与内战两手准备，一面加强党员“革命必胜”的信念教育，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和平；一面购置、收集社会枪支，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基本地区。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党组织与浙东党组织联合建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开展浙西南各县革命武装斗争。1948年春，抗暴自救军与各县武工队一起开展系列游击战争，摧毁国民党区、乡基层政权，拔除反动武装据点，锄奸反特，收缴民间枪支，切断国民党武装的通讯，与国民党武装作坚决斗争，形成了解放战争中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49年5月17日，浙西南全境解放，夺取了革命胜利。

（三）

经过发展才千余兵力的挺进师，面对国民党军数十倍兵力的大规模“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此，粟裕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抗美援朝的反细菌战

□ 史波波 徐彤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紧急在全国范围内抽调专家和防疫力量，紧急驰援志愿军。1952年2月下旬，中央军委先后向志愿军下达防疫工作指示，要求部队的防疫队和卫生人员进行紧急动员，东北防疫队待命出动，并组织京津及其他大城市的化验专家成立若干化验组前往志愿军司令部。

国内分3批次派出了50余名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等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支援前线，这些防疫专家与志愿军防疫队原有检验人员组成4个防疫检验队，其中3个防疫检验队分别配属给东线、西线和中线的3个兵团。各军和分部成立中型防疫队，师、兵站设小型防疫队，团组成防疫组，主要担负本单位的防治任务。各基层单位成立对空监测哨及扑灭小组，负责及时上报情况，现场扑灭，采集、上报标本。

志愿军还先后设立了7所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建立了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为了提高检疫技术，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举办了医学昆虫、临床检验、病理解剖、热性病诊断及细菌学检验等5个专业训练班。

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志愿军发动全体指战员开展卫生运动，总防疫委员会颁发了简明易行的个人与集体卫生防疫守则，通令全军执行，根据作战或驻防区域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志愿军各部队均进行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一齐动手灭鼠，消灭媒介昆虫，发动了保护水源、清理驻区卫生的群众性运动。各部队宿舍、伙房等张贴反细菌战卫生守约，提醒广大指战员遵守发现敌机或特务布撒毒虫立即上报、患病立即上报、口罩要清洁、不喝生水、定期洗澡等规定。

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严密的群众性防疫措施。至1952年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全国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防疫大队。东北地区人民接种了疫苗，外出要求戴帽子、手套，扎紧裤脚，同时携带镊子和小瓶子，发现美军飞机空投毒虫或可疑物品，立即夹起来放入瓶子盖紧，统一上缴烧毁。

为防止细菌和疫情传播，除在朝鲜和我国东

他的一生，与“三”有着很深的情愫：他是毛泽东三次为之挥毫泼墨的红军将领；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他牺牲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年33岁；为了纪念他，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连续作了建公略亭、设公略县、改公略炮兵学校三项决议。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黄公略。

“我们的事业有这样的同志为之奋斗，还能不成功吗？”

1898年，黄公略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农民家庭。怀着“立国之道，首在强兵”的梦想，17岁的黄公略投笔从戎，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连长、团副。在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期间，黄公略接触到很多共产党员，思想受到很大影响。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但黄公略坚信“广暴失败旗帜在，树立红军苏维埃”，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1928年7月，他和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黄公略任红五军军委委员兼十三师四团党代表。凭着出色的军事才干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为“朱毛彭黄”，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

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黄公略恨之入骨，曾贴告示，重金悬赏黄公略的人头，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围剿”被粉碎后，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企图用“亲情”对黄公略进行“招抚”，以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他先是命令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将黄公略的母亲、妻子押到长沙，又在报纸上造谣黄公略“悔过情殷、投诚心切”，还特地委任黄公略的族兄黄汉湘为宣抚使，黄汉湘派黄梅庄（黄公略同父异母的长兄）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以及1000元大洋的招抚费来江西劝诱黄公略“归正”。黄梅庄来到苏区后，就被带到了红三军团指挥部，但如何处置，彭德怀犯了难，于是便电告毛泽东并询问其意见，

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1936年12月，国民党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等调集约10万兵力，采取“大拉网”战术“清剿”闽浙赣皖苏区。挺进师提出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运用“化整为零”的分兵游击战术，使敌人的“大拉网”毫无所获，哀叹“未奏肤功”。可见，挺进师在浙西南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的方针，实现了“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略战术。

挺进师学习运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斗争的经验，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础政策，公开发动群众，公开建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这在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对于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浙西南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这种斗争方式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威胁特别大，很快遭到敌军重兵的“清剿”，使挺进师及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面对血的教训，挺进师改变斗争方式，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再公开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等，而是秘密开展群众工作，秘密建立党组织、“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以及秘密交通联络点。这样一来，挺进师“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基点”“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各种类型的游击区给游击队创造了活动自如的环境，使游击队如鱼得水，丰富和发展了根据地建设经验。

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红军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做群众工作，既当战斗队，又当宣传队、工作队，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规定有文化的战士每人每天要书写5条标语，缺少文化的战士则每人每天找10个群众谈心交朋友。红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涌现出了浙西南农民三迎红军、畲族革命老妈妈等感人故事。正如粟裕在回忆中说：“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浙西南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